標準必要專利禁令訴訟中的 幾個程序性問題

— 以華為、三星互訴案為例

胡志光、祝建軍

前言

2016年5月和7月，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為公司”或“華為”）和三星電子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三星公司”或“三星”）先後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9宗標準必要專利侵權訴訟案。

其中，華為公司針對三星公司的投資公司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惠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天津三星通信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星方”）以及深圳市南方韻和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專利號分別為ZL201110269715.3、ZL201010137731.2）糾紛兩案¹，華為公司的訴訟請求為：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發明專利權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製造、銷售、許諾銷售以及進口被控侵權產品的行為。2018年1月4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深圳中院”）判決：一、被告三星方立即停止以製造、銷售、許諾銷售、使用的方式侵害原告專利號為ZL201110269715.3、ZL201010137731.2專利權的行為；二、被告深圳市南方韻和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以銷售、許諾銷售的方式侵害原告專利號為ZL201110269715.3、ZL201010137731.2專利權的行為；三、駁回原告華為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原告三星公司訴被告華為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專利號為ZL201180027314.5、ZL200880126492.1）糾紛兩案²，原告三星公司提出的訴訟請求為：確認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發明專利權；被告立即停止以製造、使用、銷售、許諾銷售的方式侵犯原告專利權的行為。兩案開庭審理完畢並準備公開宣判，由於華

為公司和三星公司達成和解協議，原告三星公司撤回對被告華為公司的訴訟。

在審理上述華為公司與三星公司互訴的四宗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中，涉及四個方面的重要程序性問題，這是審理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新問題。結合審判實踐，擬對這四個重要的程序性問題進行剖析。

一、判斷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是否 遵循FRAND原則的時間節點是否 可以延伸至訴訟階段

處理華為公司與三星公司互訴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需要解決兩個重要問題，其一，涉案的專利是否是標準必要專利，即被告是否實施了涉案被控侵害專利權的行為；其二，雙方在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中是否遵循了FRAND原則。在通常情況下，評判雙方在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遵循了FRAND原則，需要根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商業慣例來進行考量，具體考慮因素、審查內容包括：許可協議達成需要解決哪些具體的問題，許可談判過程中雙方對這些具體問題所持的觀點是什麼，雙方在許可談判過程中都實施了哪些具體行為，這些行為對許可談判的達成所起到的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許可談判持續的時間跨度，許可談判中斷或陷入僵局的原因等。

雙方對判斷FRAND問題需要考量以上因素沒有爭議，但雙方對評判是否遵循FRAND的時間節點存有爭議。華為公司

認為，法院爲了裁判雙方糾紛，不僅應評判雙方從開始談判到案件立案受理這段期間，究竟是哪一方違反了 FRAND 原則，導致雙方談判陷入僵局；同時，訴訟的目的是爲了促成雙方達成標準必要專利交叉許可協議，因此，在案件受理後、法院做出裁判前，雙方仍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通過調解的方式（即二次談判）來達成標準必要專利交叉許可協議，而在此期間內，法院可以根據雙方在調解過程中的表現來判斷誰遵守了 FRAND 原則，誰沒有遵守 FRAND 原則。而三星公司則認爲，法院評判雙方是否遵循了 FRAND 原則的時間節點應爲雙方從開始接觸談判到糾紛提交至法院時，因此，案件受理後，法院不應以調解的方式組織雙方進行報價，也不應將雙方在調解中的表現作爲評斷其是否遵循 FRAND 原則的依據。

標準必要專利是指實施標準必然要使用到的專利或專利的某一或某幾項權利要求。標準必要專利具有共用物的屬性，爲了保障標準必要專利制度健康運行，防止專利堆疊和專利劫持行爲，各標準組織通常均要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要按照 FRAND 原則將其所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對外進行授權許可。基於權利義務對等原則，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必須要以 FRAND 原則爲基準向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支付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使用費，如此一來，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和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均負有按照 FRAND 原則簽訂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協議的義務。鑒於此，爲了促成雙方達成協議，受理標準必要專利禁令救濟之訴的法院，可以組織雙方以調解的方式，在合理的期限內，嘗試進一步讓雙方進行許可談判。

從訴訟效率角度出發，應允許原、被告在起訴後根據原告的要約及被告的反要約情況在一定期限內“修補”其要約，使其要約更符合 FRAND 的要求。權衡賦予當事人彌補過錯盡一切可能促使雙方儘快達成許可協議和同時確保有關案件審判司法效率的需求。比如，德國慕尼黑第一地區法院在禁令指南中規定：當事人雙方可以在首次庭前會議上確定自己在履行前述許可談判步驟時是否有瑕疵，並利用首次庭前會議到開庭審理之間的這個時間段對其行爲瑕疵進行補救。

從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糾紛處理的慣例來看，在談判達不成協議的情況下，選擇訴訟是爲了更好地促進談判，即訴訟的目的是爲了以訴促調、以訴促談。標準必要專利訴訟糾紛的

解決，一般短則一年，長則好幾年，在訴訟中雙方談判、授權的專利也有可能發生變化，比如，一方標準必要專利的實力發生變化等，給予雙方在起訴後繼續談判的“救濟”，更符合這類案件的審理特點。

該嘗試性做法的好處在於，一方面可以通過審判人員居中調解的方式，促使雙方把握機會理性進行談判，從而有可能促成雙方達成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協議；另一方面，審判人員在調解的過程中，也能夠切實感受談判雙方是否具有善意的談判意願，從而對長時間無法達成協議過錯在哪一方有比較清楚的瞭解和判斷。如果談判一方拒絕法院組織雙方以調解的方式進行許可談判，或者在法院組織調解談判的過程中，表現得消極懈怠、毫無誠意，明顯存在拖延談判的行爲，此時，審理案件的法院可以該談判方在調解階段的上述行爲表現，作爲認定其存在明顯過錯，違反 FRAND 原則的依據。

基於上述考量，深圳中院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向原被告雙方發出通知，要求雙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7 個工作日確定各自負責報價事務的聯絡人，並將聯絡人的姓名、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對方和法院，同時，要求雙方當事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四十日內對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使用費進行相互報價，並將每一次相互報價的內容抄送法院指定的郵箱，並事先通知法院指定的工作人員。2017 年 7 月 25 日，法院要求雙方報價的上述四十日期間屆滿，法院收到華爲公司的報價，但未收到三星公司的報價。華爲報價主要內容涉及：合同雙方，包括華爲公司和三星公司各自的關聯公司，授權許可專利的範圍，許可方式，許可費率，協議期限。

2017 年 7 月 26 日，法院再次向雙方發出通知，要求雙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內，報送各自具有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決策權、簽約權的授權代表名單（包括姓名、職務、聯繫方式、電子郵件等信息）。要求雙方的授權代表於 2017 年 8 月 22 日參加由法院主持的調解會議。

2017 年 8 月 22 日，法院組織雙方第一次調解。在調解會議上，三星公司表示其無法進行報價，原因是直接報價的條件尚不成熟。如提出報價需要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所包含的要素在調解會議上無法準確說出來。同時表示，對專利的範圍、地區、專利是否有效、專利的必要性、是不是構成侵權，對這些侵

權的評估怎麼做，都需要談判雙方有共同的想法後才能進行到下一步。法院組織的第一次調解會議，由於三星公司未進行報價，未取得進展。

法院接着通知雙方，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開第二次調解會議，要求三星公司以列清單的方式明確提出報價的前提條件。同時，向雙方釋明：法院在裁判華為與三星之間的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件時，雙方在法院組織調解過程中的行為，將成為法院評判雙方在談判過程中是否遵循 FRAND 原則的依據。

2017 年 9 月 12 日，法院組織雙方召開第二次調解會議。在這次調解會議上，三星公司稱提出報價的條件有四項，即：許可專利的範圍、許可產品的範圍、許可專利的地域範圍、許可期限等。針對三星公司的觀點，華為公司認為，三星公司提出的這些條件不是雙方進行知識產權談判的前提，而是需要進行知識產權談判的內容和需要解決的問題。華為在過去五年的報價及訴訟中，進行了多次報價，並發送相應的許可協議文本草案，裏面都包含了三星公司提出的這些許可前提條件，但三星公司從未實質性地對上述問題予以回應。三星公司稱，三星公司在涉案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發生糾紛前，已經依據華為訴 IDC 案的判決所確定的費率向華為公司提出了符合 FRAND 原則的報價。但由於之前談判所依據的情況和目前的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還需要對許可的前提條件進行重新談判。在這次調解會上，法院告知三星公司，如果願意對華為公司的報價進行實質性回應，應在 2017 年 9 月 19 日之前提出，法院將依據開庭和調解的情況進行判決。

2017 年 9 月 15 日，三星公司申請將實質性回應的時間延長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為了促成雙方達成標準必要專利交叉許可協議，法院同意三星公司的延期申請。2017 年 9 月 22 日，三星公司提交針對華為公司報價的回復意見，主要內容為：針對華為公司的此次報價，三星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13 日已進行實質性回復，但鑒於三星公司上次報價時的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雙方應當首先就報價的前提條件達成一致意見，才能實質有效地推動雙方之間的談判，現再次提供三星公司 2016 年 12 月 13 日已進行實質性回復的完整內容：按照法院對於雙方專利糾紛調解的要求，三星公司僅向法院提交本條款清單，本

條款清單是三星公司目前針對雙方 SEP 組合的全球交叉許可報價，包括當事人，管轄法院選擇以及爭議解決，適用法律，許可專利，許可產品，許可方式，許可的地理範圍，生效日期，歷史豁免，保密，許可費率等 11 項。

2017 年 10 月 20 日，華為公司答復三星公司的上述回復意見：接受三星公司提出的上述第 1、2、3、4、5、8、9、10 項，對許可方式，許可的地理範圍，許可費率問題進行了修改。雙方在法院組織下的第二次調解，仍未取得進展。

深圳中院結合訴訟前雙方二十次談判，以及訴訟階段調解中雙方談判報價的事實，認定三星公司在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中違反了 FRAND 原則，存在明顯過錯。

二、標準必要專利的認定是否需要司法鑒定的問題

審理標準必要專利禁令救濟案件，受案法院需要查明涉案專利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對該技術事實的查明，是審理這類案件的重點和難點。無線通信領域標準必要專利的特點是，各標準組織對其成員聲明的標準必要專利是否是真正的標準必要專利，並不進行實質性審查。由於聲明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數量龐大，且聲明的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日益分散，因此，業界的慣例是，各無線通信企業先實施標準必要專利，再由各聲明的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進行許可談判和付費，即先使用、後談判、再付費。正是基於標準必要專利的上述特點，聲明的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向司法機關起訴要求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被控侵權行為人）停止侵權的訴訟中，判斷涉案專利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就要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與 3GPP 相對應的技術標準進行比對。

判斷涉案專利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有特定的論證邏輯和證明方法，結合國內外司法實踐，深圳中院在審理中確定以下證明和論證步驟：

第一步，由原告選擇涉案專利的保護範圍。比如，在華為訴三星 816 號案件中，涉案專利總共有 12 項權利要求，華為選擇專利權利要求 1、2、9、10 作為其專利的保護範圍。在三星訴華為 1382 號案件中，涉案專利總共有 32 項權利要求，三星選

擇專利權利要求 1-3、7-11、15-19、23-27、31、32 作為其專利的保護範圍。

第二步,原告舉證與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相對應的 3GPP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的具體內容。由於 3GPP 的技術標準非常龐雜,且用英文撰寫,因此,原告要找出與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相對應的 3GPP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比如,在華為訴三星 816 號案件中,原告舉證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覆蓋了 3GPP 國際標準 3GPP TS 36.212、3GPP TS 36.213、3GPP TS 36.321 文件中 RELEASE 8、9、10 三個版本中的 9 個文件。在三星訴華為 1389 號案件中,原告舉證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覆蓋了 3GPP 國際標準 3GPP TS 36.212 V9.0.0、3GPP TS 36.211 V9.0.0 兩個文件。

第三步,原告舉證 3GPP 國際技術標準被我國通信行業和通信運營商採標。在華為訴三星案和三星訴華為的案件中,原告舉證 3GPP 國際技術標準被工信部採標並公佈、實施;同時,上述 3GPP 國際技術標準被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三大電信運營商採標並公佈、實施。

第四步,原告論證和證明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與相對應的 3GPP 國際技術標準進行對比,二者在技術特徵上形成一一對應關係,從而證明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為標準必要專利,進而能夠進一步論證,若被告在我國生產、銷售無線終端產品,就一定使用原告的涉案專利技術。在華為訴三星案和三星訴華為的案件中,華為和三星都採用了該證明論證方法。

以上證明和論證步驟,涉及複雜的無線通信技術事實查明問題。在通常情況下,法院查明技術事實通常採用如下方法: 1、在法庭上,組織原、被告雙方對涉及技術事實方面的證據進行舉證、質證,以查明案件事實。2、聽取原告或被告聘請的專家輔助人對技術問題的講解,逐步弄清楚案件所涉及的技术事實。3、在上述方法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可以啟動法院專家庫諮詢程序,通過請教案件所涉技術領域的技術專家來講解技術問題,以便查明涉案的技術事實問題。4、如果通過上述方法仍無法解決,可以根據申請人的申請,由法院委託鑑定機構通過司法鑑定來查明涉案技術事實。

由於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技術事實的查明,目前屬於高

科技領域裏的前沿技術問題,對這些技術的掌握與運用主要集中在無線通信高科技企業,法院的專家庫中沒有該領域的專家,司法鑑定專家中能對該領域技術問題進行鑒定的鳳毛麟角。鑒於該現狀,對標準必要專利技術事實的查明,通常情況下依賴發生糾紛的雙方通過委託訴訟代理人或專家輔助人通過陳述、講解、辯論等方式來進行查明,却很難通過法院諮詢專家庫或委託司法鑒定的方式來查明。

在華為與三星互訴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案中,雙方均向法院申請公司內部的技術人員作為專家輔助人出庭,在事先將專家輔助人的名單提交給法庭,徵得法庭同意並簽署保密協議後,原、被告雙方的專家輔助人參與案件技術事實的查明程序,就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技術與相應的 3GPP 國際技術標準之間在技術特徵上是否形成一一對應關係進行陳述、講解、辯論,最終幫助法院查明該技術事實問題。

應注意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案件的雙方往往處於互訴狀態,為了制約對方,雙方有時均會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複審和無效審理部(以下簡稱“國家知識產權局”)宣告對方的專利無效,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無效宣告結果,也可以作為處理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所涉技術問題的重要方法。因為原告提起標準必要專利禁令之訴的前提條件是,其涉案要求保護的專利或專利的具體權利要求,必須處於合法有效狀態。在三星訴華為(2016)粵 03 民初 1382 號案中,三星要求保護的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8、16、24、32 被國家知識產權局宣告無效。法院根據該無效決定,以裁定的方式駁回了三星以上述專利權利要求對華為提起的訴訟。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無須再查明這四項專利權利要求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技術。

三、關於美國加州地區法院禁止華為執行深圳中院判決的禁執令問題

2018 年 1 月 8 日,深圳中院對華為訴三星(2016)粵 03 民初 816、840 號案進行宣判,深圳中院認為,華為涉案專利為 4G 標準必要專利,三星方在中國生產、銷售 4G 手機等終端產品一定會使用華為的 4G 標準必要專利。由於華為在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談判的過程中遵循了 FRAND 原則,沒有明顯過錯,而

三星在許可談判的過程中未遵守 FRAND 原則，存在明顯過錯，因此，判決三星方立即停止侵害華為的涉案專利權的行為。一審宣判後，三星不服向廣東高院提出上訴。

2018年2月1日，三星向美國加州北區地方法院提出申請，請求禁止華為在美國法院訴訟未決期間執行深圳中院做出的責令三星停止侵犯華為 4G 標準必要專利的判決。2018年4月13日，美國加州北區地方法院裁定，在美國法院判決華為與三星所涉及的違反合同義務糾紛之前，華為不得申請執行深圳中院作出的責令三星停止侵害華為兩項 4G 標準必要專利的判決。華為不服，對該禁執令提出上訴。

美國加州北區地方法院作出這個禁執令（禁訴令的一種）的背景是，華為就三星侵害其專利權在同一天向美國法院和中國法院提起訴訟，因為時差的原因，美國訴訟顯示的時間要比中國訴訟早一天。標準必要專利訴訟的當事人可以基於相同或近似訴因在不同的國家提起訴訟，從而產生標準必要專利國際平行訴訟問題。華為在我國法院和美國法院起訴三星，即屬於該種情形。在通常情況下，當發生國際平行訴訟時，每個國家的法院都是按照自己國家的法律對案件進行審理，不會對他國法院進行的平行訴訟進行干涉。就本案而言，基於三星的申請，美國法院對華為頒發禁訴令，干擾了本案當事人華為的民事訴訟活動，妨礙了我國法院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行為。如果華為在美國法院判決華為與三星所涉及的違反合同義務糾紛之前申請執行深圳中院的判決，將可能受到美國法院的處罰。

從比較法的角度看，針對英美法系對德國自然人和法人頒發的禁訴令，德國法院認為，英美法院頒發的禁訴令雖然從表象上看針對的是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但其阻止了德國法院履行自己的職責，侵犯了德國的司法主權，並會通過頒發反禁訴令予以反制。³由於我國缺乏禁訴令及反禁訴令機制，不僅難以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反制，也無法構建爭議解決的主場優勢。⁴面對域外法院頒發的禁訴令，我們認為，我國法院可以在個案中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00 條規定的行為保全制度，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責令參與我國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撤回其禁執令申請。同時，如果該當事人不執行法院責令其撤回禁執令的裁定，可以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111 條第 1 款第 6 項的規定，對其予以罰款或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就華為訴三星案而言，美國法院對華為頒發的禁訴令沒有法律基礎，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勝訴方申請執行的依據是生效的法律文書，本案由於三星提出上訴，本案生效法律文書的依據應為廣東高院的終審判決，所以三星上訴以後，申請對深圳中院的判決頒發禁訴令沒有實際意義，除非三星不提出上訴，深圳中院的判決生效。考慮到美國法院對我國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其頒發的禁訴令沒有法律基礎，加之華為和三星均存在和解決糾紛的意願，為了促成雙方達成和解，避免矛盾激化，深圳中院沒有針對三星頒發反禁訴令性質的行為保全措施。

2019年5月，在廣東高院二審審理華為訴三星案時，雙方達成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協議，雙方同意各自撤回全球訴訟，一攬子解決了雙方在全球 44 件訴訟糾紛。

四、關於在標準必要專利禁令訴訟中能否將確認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侵犯發明專利權作為一個判項的問題

在三星訴華為 1382、1389 號案件中，三星向法院提出的訴訟請求為：1、確認被告華為侵犯了原告三星的發明專利權；2、被告華為立即停止以製造、使用、銷售、許諾銷售的方式侵犯原告三星發明專利權的行為。三星向華為提起標準必要專利禁令之訴，但其在訴訟請求中還提出“請求法院確認被告華為侵犯了原告三星的發明專利權”，原告三星稱，中國專利法已確立“確認不侵權之訴”，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同時提出“請求確認侵權”亦具有訴的利益和必要性。那在標準必要專利禁令訴訟中能否將確認標準必要專利實施人侵犯發明專利權作為一個判項呢？該問題頗值得研討。

對於該問題，我們認為，專利法司法解釋規制的確認不侵犯專利權之訴在性質上為確認之訴（確認法律關係的訴），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專利權人濫用權利，以明確被侵權警告方是否構成侵權，從而保障其正常的市場經營行為。專利侵權之訴在性質上為給付之訴，其目的是為了解決被告是否承擔停止侵權或賠償損失的問題。在專利侵權訴訟的司法實踐中，確認被告是

Several Procedural Issues in SEP Injunction Litigation

— A Study Based on Lawsuits Between Huawei and Samsung

Hu Zhiguang and Zhu Jianjun

Introduction

In May and July 2016,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uawei”) and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hereinafter as “Samsung”) successively filed a total of nine lawsuits concerning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 infringement with the Shenzh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ereinafter as “the SZ Intermediate Court”).

Among the lawsuits, two¹ were brought by Huawei against Samsung’s investment companies, namely, Samsung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Huizhou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and Tianjin Samsung Telecom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as “Samsung entities”) as well as Shenzhen Nanfang Yunhe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as “SZ Nanfang Yunhe”) for infringement of invention patents Nos. ZL201110269715.3 and ZL201010137731.2 respectively, in which Huawei claimed for the defendants’ immediate cess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s in sui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anufacturing, selling, offering for sale, and importing of the accused infringing products. On 4 January 2018, the SZ Intermediate Court decided that: 1) the defendants Samsung entities shall immediately cease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laintiff’s patents Nos. ZL201110269715.3 and ZL201010137731.2 in the manners of manufacturing, selling, offering to sell, and using the accused infringing products; and 2) the defendant SZ Nan-

fang Yunhe shall immediately cease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laintiff’s patents Nos. ZL201110269715.3 and ZL201010137731.2 in the manners of selling and offering to sell the accused infringing products; and 3) the rest of the claims filed by the plaintiff Huawei shall be dismissed.

And two lawsuits were brought by Samsung against Huawei for the infringement of invention patents Nos. ZL201180027314.5 and ZL200880126492.1,² in which Samsung’s claims were: confirmation of the defendant’s infringement of its invention patents, and the defendant’s immediate cessation of the infringement of its patents in the manners of manufacturing, using, selling, and offering to sell the accused infringing products. Upon the court’s conclusion of the hearing of the two cases and in advance of its issuance of judgments, Samsung withdrew the lawsuit against Huawei as a settlement had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trials of the above four SEP infringement actions between Huawei and Samsung involved four major procedural issues, which are new issues to be confronted and addressed in adjudicating SEP infringement dispute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elve into these four issues in the light of trial practice.

否侵犯了原告的專利權，通常是作為案件事實來查明，而不是作為判項來處理。因此，原告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一併提出請求法院確認被告侵犯原告專利權的訴訟請求，缺乏法律依據，不應獲得支持。■

作者單位：深圳知識產權法庭

¹ 案號為(2016)粵03民初816、840號。

² 案號為(2016)粵03民初1382、1389號。

³ 祝建軍：“我國應建立處理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的禁訴令制度”，載《知識產權》，2020年第6期。

⁴ 羅東川：“建議我國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法”，載《中國審判》，2020年第10期。